

传播媒介变迁的四体演进：一个符号修辞学分析

曹 丹 陈华明

摘 要：在媒介化社会中，从发展史的角度宏观地把握传播媒介的形态及变迁进程，有助于理解当今传播媒介的发展样态与未来可能。媒介不仅是工具，还具有表意性。本文突破传统媒介研究的“工具性”局限，从符号修辞学的视角出发，借用“四体演进”理论，分析传播媒介在形态变迁历程中的不同表意模式，梳理出一条从媒介表意角度来认知传播媒介形态及其变迁的路径，认为传播媒介的发展变迁不全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信息需求与表达同外部世界互动的结果，人类的传播媒介在经历了隐喻阶段、转喻阶段、提喻阶段后，发展到了反讽阶段。本文还对传播媒介在反讽阶段之后的形态走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传播媒介变迁，四体演进，符号修辞

The Four-Tropes Evolution of Media: A Semiotic Rhetorical Analysis

Cao Dan Chen Huaming

Abstract: In our mediated society,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of the current media based on their form and process of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edia are not only tools but also ideogram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t ideographic modes of the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morphological change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of the four master tropes in semiotic rhetoric rather than the

limited instrumentality of traditional media research. It identifies a cognitive pa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dia's modes and chang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edia signification". Media development is seen as a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human demands for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phases of metaphor, metonymy, and synecdoche, human media have developed to the stage of irony. The morphological trend of the media beyond the phase of irony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changing process of media, evolution of the four-tropes, semiotic rhetoric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10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当前时代的传播媒介形态较过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媒介形态日新月异,电脑、智能手机、可穿戴智能设备、VR/AR 虚拟媒介,等等,曾经的科幻场景似乎正变为现实,这引发了众多讨论。新形态的传播媒介在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同时,也亟待进一步理解。

(一) 作为工具的传播媒介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回溯、把握、理解媒介,是厘清当下媒介现状和预见媒介发展未来的必经之路。对于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国内外学者在媒介历史进程这一动态视角下进行了不少讨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导媒介(洛根,2012, pp. 24 - 25),延森(Klaus Bruhn Jensen)认为“媒介理论就是媒介史的产物”,他从媒介的物质性、特定媒介及其传播实践对社会的影响出发,将媒介划分为三种类型:作为人际交流的媒介的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传播媒介、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技术(延森,2012, p. 67)。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依据人类传播的编码技术,将传播媒介的历史划分为文字的历史和技术媒介的历史,并进一步将其分别划分为手稿、印刷品,模拟媒介、数字媒介(基特勒,2013, pp. 235 - 254)。我国著名传播学家邵培人在其《传播学》(2007)中指出,人类共经历了五次由新媒介的产生引发的传播革命,人类历史上陆续出现的

媒介为：语言、文字、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

梳理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对传播媒介变迁历程的探讨着重考量媒体与人的主体性的互构关系，进而窥见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多从技术角度、传播实践角度、媒介物质性角度展开，局限于媒介的“工具性”范畴。但是，如果将传播媒介的形式及历代变迁纳入符号修辞学的范畴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在工具性之外发现一个理解传播媒介变迁的崭新维度——传播媒介的表意性。

（二）作为表意模式的传播媒介

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任何教条，任何概念，甚至任何事业，本质上都是—种符号表意模式”（2016，p. 216）。传播媒介也不例外。对于媒介的理解，研究者们各抒己见、逐步深入。有人认为传播媒介就是符号的具有技术性的物质载体，承载的是传播内容的符号表达，这是一种在媒介工具性范畴内的理解。本文认为，传播媒介的载体形式与内容形式须统一而论，即传播媒介是传播技术物质载体和传播技术带来的内容的统一，单论其一不成其为本文所谓“传播媒介”。比如，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指的是运用电子技术的物质载体电视机及其所带来的声、画信息内容的统一。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媒介也就突破了“中介物”的理解限制而成为一种符号表意系统。

传播媒介的表意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是媒介表达的角度。学者张骋认为“媒介是表达事物形式的符号，或者说人类所有的思想和情感都必须通过符号媒介的表达才能被人感知”（2017，p. 49）。当代批评家、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更是论证了技术和人类的同源性，从他的理论角度看，“媒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生命、与人类的“外生系统”以及它与所产生的具体效果的历史有着必然牵连的概念。可以说，媒介在本质上是生命体和环境之间的连接运作（Hansen，2006，pp. 297 - 306）。让人获得体验的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是表达形式的符号，是表意的。其携带的意义，就是与人本身相对的外部世界。第二，是媒介功能的角度。媒介对社会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的“媒介即讯息”论断影响甚广，该论断认为，对于文化而言，媒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传播中最本质的部分不是传播内容，而是传播媒介本身，媒介形态本身影响、塑造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2000，p. 33 - 50）。伯纳德·斯蒂格勒也认为媒介本身的形式才是意义之所在，媒介才是文化真正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表

意模式,媒介的形态象征着不同的文化形态。传播媒介不仅仅是工具,还是一种符号表意系统,表达着人类的外部世界,影响着人类文化的进程。

如此而言,传播媒介形态的变迁也是传播媒介表意模式的变迁。那么,如果基于传播媒介的表意性,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解传播媒介,理解其发展和变迁呢?传播媒介形态变迁中的意义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历程带来怎样的预示和反思?基于此,本文将突破以往对媒介变迁研究的工具性范畴的局限,梳理出一条从媒介表意角度来宏观地认知传播媒介形态及其变迁的路径。本文将从符号修辞学切入,探讨、阐释人类历史上陆续出现的媒介形态及其变迁背后更为本质的修辞逻辑。

二、理论视角:符号修辞与四体演进

(一) 符号修辞

传统修辞学研究多集中于语言领域。20世纪,语言学研究发生转向,符号学研究蓬勃发展,符号修辞学兴起。符号修辞学扩展了传统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广告、电影、新闻、科技、媒介等都进入其研究视野。众多研究者中,影响最深远的要属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符号比喻的特点是喻体与喻旨之间的强迫性连接,展现两个截然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突出“异中之同”。其中明喻的特点是直接的强迫性连接;隐喻的这种连接有一定的开放性;转喻的特点是邻接性,是用一种事物替代相互关联的另一种事物;提喻的特点是“具体替代整体”,其喻体与喻旨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反讽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意义被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它表达的不是直接旨意,而是相反的意思(赵毅衡,2016)。巴尔特强调,明喻、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等修辞手法蕴含着媒介文本的深层话语(巴特,2008, p. 265)。所以,明喻、隐喻、转喻、提喻、反讽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表达技巧,还是布斯(Wayne Clayton Booth)所言的“思想的根本形式”(2009, p. 31)。从符号修辞这个角度来讨论传播媒介时,我们不仅可以从微观上,即从具体传播媒介的表意模式方面来探讨其符号修辞效果,还可以在宏观上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去看待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变迁。

(二) 四体演进

本文借用符号修辞学的“四体演进”理论来观照、阐释人类历史上陆续

出现的传播媒介的文化内涵及其关联与变迁。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将四种修辞方式（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称为“四大修辞格”。赵毅衡对四体演进的研究进行总结和推进，认为四体演进关系是“从隐喻开始，文本题材两层意义关系逐步分解的过程，四个修辞格相互都是否定关系：隐喻（异之同）—转喻（同之异）—提喻（分之合）—反讽（合之分）”（2016，p. 214）。最早提出四体演进关系的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的退化过程：“神祇时期”，比喻为主，是神权时期；“英雄时期”，转喻为主，是贵族时期；“人的时期”，提喻为主，是理性时期；“颓废时期”，反讽为主，意识走向谎言（赵毅衡，2016，p. 214）。修辞四格的演进模式被很多研究者应用到不同领域，皮亚杰（Jean Piaget）用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用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怀特（Hayden White）用以研究历史写作的方式；我国学者任伟借用四体演进探讨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王立新用四体演进分析中国电视剧影像话语的变迁，等等。赵毅衡在其符号学研究中明确提出：四体演进关系是符号表意形式的一般规律，“形式史就是文化史，随着程式过熟，必然走向自我怀疑，自我解构”（2016，p. 214）。

本文从符号修辞角度宏观地考察传播媒介的变迁历程，借用四体演进规律阐释传播媒介的变迁路径，为理解传播媒介及其发展和动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野，对于把握当代传播媒介纷繁现状、预测未来传播媒介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

三、传播媒介变迁的四体演进

传播媒介表达和反映着外部世界，影响着一个时代的人类文化，具有表意性。在这个角度上，传播媒介的变迁经历了“四体演进”的进程——经过隐喻、提喻、转喻阶段，进入反讽阶段。特别要说明的是，这种四体演进是随着时代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的变迁更替而推进的，并不受媒介技术发展中的共时性的影响。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主导传播媒介，这个媒介最符合当时人类的信息需求，对当时的人类文化影响最为深刻。

（一）隐喻时期：以口语作为主导传播媒介

距今约9万至4万年前，语言诞生了，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语言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研究者们无法直接追溯其起源，更

多是通过猜测来了解。众多观点中,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是:语言起源于劳动。随着劳动复杂化,人类大脑得到锻炼,发音器官也得到进化,并有了交流经验、发展知识的需求和说话的可能。但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个体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变得必要和重要。经过数百万年,人类学会了归纳信号,不仅会通过声音将信息传递给同伴,还学会针对特定事物发出特定信号,长期进化下来,某种信号就代表了某种特定的含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声音表意不断丰富和发展,口语出现了。

考察各类关于口语诞生的观点,其本质上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认为口语与人类的经验和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是对人的经验、行为的直接反映。也就是说,口语作为传播的媒介,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呈现。从符号修辞角度看,口语与外部世界之间呈现一种直接的强迫性连接,这种连接形成了比喻关系。

比喻是利用另一事物来看待这一事物,二者之间有明确连接。隐喻就是其解读有一定开放性的比喻,喻体和喻旨之间的连接比较模糊,没有强制性,这种连接往往只是发出者的意图。隐喻,突出“异中之同”,表现两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但这两种事物几乎截然不同。从口语的诞生和表意中,我们可以看出,口语用发音来看待外部世界,它与外部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连接,但这种连接并不是固定而明确的,而是模糊的,比如发音 [gu:d],不同的人对于其表意的解释可能不完全一致;同时,口语和外部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二者间的连接基于特征相似性。所以,口语是一种隐喻性的媒介。

另外,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观念认为,与隐喻相对应的是“神祇时期”,社会充满神权。根据媒介环境学派先驱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语言是一种时间偏向的媒介,其早期无法储存、出口即逝的特性,使得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大量信息被压缩成神话、宗教等结构形式,以此实现集体记忆管理。口语必须面对面交流,无法突破空间局限,这使得文化纵向传播,产生对抗时间的力量,城邦和宗教结为一体成为口语时期常见的帝国组织形式,由此生成口语时期重视传承、敬畏历史、宗教盛行、神权至上的传统(Innis, 2008)。口语时代神权的形成,正是口语这种传播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特点的体现,这也进一步表明了语言的隐喻特性。

(二) 转喻时期:以文字作为主导传播媒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远祖们找到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分离开来并加以保存的技术,文字便产生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让文字取

代口语，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将“完全意义上的文字”定义为充分调动词语特性的编码符号，通过充分调动词语的特性，将语音的结构或所指用符号表现出来，用激发观念的符号来抽象和表征经验。简言之，“文字不是事物的表征，而是语言的表征，是人说出的词语或想象中说出词语的表征”（翁，2008，p. 64）。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内容本身总是另外一种媒介（2000，p. 34）。在这个意义上，文字这一媒介的内容是语言，而“文本则可以根据其是否把日常语言转换成象形文字、音节或音位符号来进行分类”（刘丽，2018，p. 19）。

在符号修辞学上，与隐喻的直接连接相比，转喻的特点是具有邻接性，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邻接，是用一种事物替代相互关联的另一种事物。“转”即寻找“替代品”。从符号修辞的角度看，在传播中，如果语言是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那么文字就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对外部世界的间接抽象，它与外部世界邻接；用抽象的字符文本替代现实的外部世界，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转喻。

另外，文字是一种体外化的媒介，有突破传播时空限制的可能。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传播因其载体昂贵、依赖手抄而未实质性地与人的身体分离，所以没有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没有对人类传播形成决定性的影响，人类传播依然处于口语阶段。1450年古登堡对印刷术的革新，使文字被储存进可移动的、可被大量复制的印刷物中，文字真正地离开了人体，具有了可体外传播的特性。这让信息传播开始大规模突破时空限制，促使文字的传播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

人类传播历程进入以文字印刷品为主导传播媒介的时代后，文字的体外传播特性让信息交流不再依赖于在场。由于读者和作者可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前的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的倾向，这动摇了传统的权威，促使口语传播时期的神权下移。文字的接收能力需要后天习得，因而识字、阅读能力的差异导致了阶层之间的“知沟”，民众从贵族阶层分离，社会权力集中于贵族阶层手中，神权下降为贵族之权。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观念认为，与转喻相对应的是“英雄时期”，充满贵族气息，贵族和民众截然分开。由此而言，文字体外传播特性的充分发挥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正是其转喻功能的体现。

（三）提喻时期：以电子媒介作为主导传播媒介

19世纪，电子媒介出现。电子媒介是指运用电子技术、电子设备和其产

品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录音、光碟等。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的普及,电子媒介时代到来。较之口语和文字,电子媒介革命性的信息表达特点有二。第一,在信息的呈现上,对外部世界高度还原。基于无线电技术和摄影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同时具备声音、图片、文字等功能,实现了对图景和声音的异地呈现,现实图景不再稍纵即逝,而是作为信息被保存并“真实地”“原模原样地”传递给信息接收者。第二,在信息的传输速度上实现了跨时空瞬时传输。电子技术让电子媒介的信息传输脱离了运输的物质载体,“超越了所有文字形式的信息传播速度,使得距离长短不再是个值得计较的问题”(基特勒 & 黄淑贞, 2013, p. 244)。传播的瞬时性使得电子媒介信息更加直观、生动、形象。总之,电子媒介让信息接收者似乎并不需要环游世界,就能直观地接触到整个外部世界。

电子媒介的这种表意方式正是符号修辞中的提喻,其喻体与喻旨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局部喻指整体或以整体替代局部。“几乎所有的图像影视都是提喻,因为他只能展现真实图景的某一部分”(赵毅衡, 2016, p. 190)。根据前文的分析,电子媒介通过声、图、文的综合瞬时传播,似乎为信息接收还原了一个现实世界,但其实,这个被还原的现实世界并不真的是全部的现实世界,而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侧面或者一部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的观点,认为传播媒介为大众提供的并不是现实环境的客观再现,而是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展示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并不等同于真实环境,“它仅仅是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给我们可以感受、适合体验的‘影像’世界,它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只是现实世界无比丰富多彩的信息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李苓, 2002, p. 122)。由此而言,电子媒介就是通过部分地还原外部现实世界而营造一种“准真实世界”来对外部世界进行提喻。

另外,电子媒介还具有提喻性的社会文化功能。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观念认为,与提喻相对的是“人的时期”,人代替神或英雄,成为主人公。在传播中,一方面,电子媒介形象化的“还原”表达使得人们对其内容理解并无障碍,这让电子媒介迅速被人们接受和使用;另一方面,其“一对多”的信息传播形式也让更多人能够接收信息,极大地扩展了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由此,电子媒介的大众性凸显,成为绝对的大众媒介,就像《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言,20世纪出现的大众媒体文化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媒介——电视与广播制造的特定产物(安德森, 2015, pp. 21 - 22)。电子媒介对信息的传播标志着大众文化时代的真正到来,使每

一个普通人都成为社会文化运转的中心。

（四）反讽时期：以数字媒介作为主导传播媒介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形态再一次经历变革，从电子信息技术升级为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变成了建立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基础上的数字媒介。与过往媒介比较而言，数字媒介最大的进步是改变了媒介信息的存在方式——由原子转向了比特。“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尼葛洛庞蒂，2017，p.5），而且“大容量的数字网络，让我们可以在所需的任何时间向任何地点传递信息”（米切尔，2001，p.2）。信息传播的最小单位由原子变为比特，这不仅让“信息几乎可以附着于任何东西，附着于人类生存环境的任一角落，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李沁，2015，p.9）。由此，数字媒介技术最大限度地突破了传播技术史上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时空障碍，彻底解决了信息的储存和自由移动问题，使得随时随地获取海量信息成为可能。同时，数字媒介压缩了信息传播时空，将“此时此地的我”与“远距离的现场”连接起来，“那些寻求真知的人们再也不必长途跋涉去遥远的地方获取信息，甚至不用去当地的图书馆。因为，书店、报摊、杂志架、剧场、寺庙和教堂——甚至菩提树——都有了虚拟的替代物”（米切尔，2001，p.6）。人的信息传播活动就此“从物理性的现实空间延展到了虚拟性的赛博空间”（周旭，2018，p.122），人类在虚拟空间中出现身体镜像，它将生物智能和数字智能结合在一起，“数字连接人”的出现（陆正兰，赵勇，2020）使得人类进入一种数字化的生存状态，具有互动性、虚拟性、超真实、建构性等特点。

这样的数字媒介形态，从符号修辞的角度来看，充满反讽的特征。可以说，数字媒介形态的形成标志着媒介反讽时代的来临。赵毅衡认为，“反讽是另一种超越修辞格的修辞方式。反讽是符号对象的排斥冲突，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意义被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反讽表达的非但不是直接指义，而且正好是相反的意思”（2016，p.205）。当把反讽放到大局面文本中考察时，会出现大局面反讽，大局面反讽是意图与结果之间出现反差，而且结果恰好是意图的反面。

首先，从媒介表达方式角度分析。数字媒介储存海量信息并进行传播，使得信息接收者们非常容易无尽地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数字媒介的信息无限可得性使获得全部信息、看清世界的真实面貌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海量纷杂的信息传播造成信息超载，各种信源模糊甚至匿名

的信息漫天飞舞, 未被加工的碎片化信息、众多无确切事实根据的推测和观点、大量充满商业意味的煽动性信息, 等等, 充斥着数字媒介空间。信息论提出者香农 (Claude Elwood Shannon) 定义信息为“不确定性的消除” (王勇, 黄雄华, 蔡国永, 2013, pp. 28 - 30), 但在数字媒介中, 海量的模糊、碎片化信息恰恰增加了信息接收者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不确定性, 真相反而变得更加模糊, “后真相”时代到来。在信息表达层面上, 数字媒介的实际意义与意图意义可谓背道而驰, 反讽意味十足。

其次, 从媒介功能的角度分析。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观念认为, 与反讽相对的是“颓废时期”, 是人的主体性上升、个人意识觉醒的时期, 也是人类社会逐步走向自私自利、道德沦丧的时期。基于 Web 2.0 的数字媒介塑造了一个赛博空间, 这个空间最大的特点是互动性与虚拟性。在赛博空间中, 数字媒介对现实生活进行仿真再造, 使用数字媒介的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超真实”的仿佛虚拟世界中。在这个超真实世界中, 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 网络社会事实符号化的操作门槛低、获利可能大、社会治理难等因素导致经重构的社会事实质量参差不齐 (吴海琳, 王敬贤, 2020), 人们相信符号的力量超过现实的力量, 依靠着符号来生活。在这个超真实空间中, 人们可以远距离交流、合作; 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身份, 人的地位不再受现实身份的限制。赛博空间是现实空间的仿真再造, 现实空间也受赛博空间影响而发生着变化, “现实世界的寡头被网络民主替代” (弗雷泽 & 杜塔, 2013, p. 131); 社会权力“去中心化”, 变得更加分散, 人人都是传播者, 人人都有话语权, 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提升, 个人意识获得觉醒。“数字媒介真正的价值也越来越和信息无关, 而和社区相关” (尼葛洛庞蒂, 2017, p. 19), 数字媒介颠覆了外部世界。由此可见, 反讽在数字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上发挥作用, 推动社会文化进入了反讽阶段, 数字媒介是具有反讽功能的媒介形态。

四、结语与展望: 反讽之后的主导传播媒介

人类传播媒介的变迁历程遵循着四体演进的规律, 陆续经历了隐喻、转喻、提喻阶段, 正处于反讽阶段, 各个阶段的主导传播媒介特性形塑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这表明: 第一, 媒介的变迁并非纯粹是技术发展的结果, 也是人类信息需求与外在世界互动的结果, 四体演进是一种规律, 具有必然性, 媒介在发展中走向反讽是其形态演变的必然; 第二, 新媒介形态是对旧媒介

形态的推翻和重建，四体演进的四个修辞格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媒介发展中的每一种形态不是对前一种形态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彻底的推翻和重建，即新媒介不是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延展出来的，而是一种完全新生的技术、逻辑和关系，表意出全新的文化形态。

那么反讽之后的媒介形态又将如何改变？维柯的历史循环论认为，当一个周期结束后，第二轮新的四体演进循环又将开始，但新的循环不是机械式的复演，而是不断变动、发展与更新的。赵毅衡指出，“某种文本一旦走到头，此后的怀旧仿作都是增加反讽式苦味的余波，不可能复活这种表意方式，重新开始的是另一种表意方式，文化必须靠一种新表意方式重新开始，构成一个从隐喻到反讽的漫长演变”（2016，p. 217）。

当下传播媒介发展的反讽阶段，还出现了一个同样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特征——人工智能，比如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它们能够与人沟通、执行人的指令。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媒介进化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媒介技术的进化始终致力满足人类的需求与选择，在人和社会环境的推动下，向着人性化的方向进化（莱文森，2003，p. 86）。如果说语言、文字、电子媒介和目前阶段的数字媒介都是在致力消除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物理距离的话，那么数字媒介在发展中朝向的人工智能阶段就是在致力消除人与机器之间的心理距离，“赋予死板、冰冷的机器以智能（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和‘温度’，让人与机器在整体智能层面上进行平等、无障碍的沟通，在人与机器之间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吴伯凡，2017，p. 48）。

很明显，真正的智能媒介与当下的数字媒介是有很大区别的，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所谓智能媒介只是数字媒介发展的一个巅峰状态而已，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智能媒介时代已经到来，或者传播媒介进化的下一个时代就是智能媒介时代。智能媒介是将成为媒介形态的整体转向，还是仅为数字媒介发展的一个阶段？回答这个问题尚待时日，因为“一种媒介，要完全展现自己独一无二的特征，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黄旦，2019，p. 26）。从口语到文字再到电子媒介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当下我们所处的反讽媒介阶段，如果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算起，还不到一百年。但能够肯定的是，传播媒介的表意不会停止进化，传播媒介的形态不会停止变迁。一方面，传播媒介将越来越还原人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能够处理来自外在世界的不同属性的信息，成为统一、多面的信息处理系统；另一方面，传播媒介将更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也许有一天，传播媒介将进入新的阶段，它不再是信息媒介，

而是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只有当其不存在时，我们才感觉到它的存在。

引用文献：

- 安德森，克里斯（2015）. 长尾理论（乔江涛，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巴特，罗兰（2008）. 图像修辞学（方尔平，译）. 载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编），语言学研究，6.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布斯，韦恩·C.（2009）. 修辞的复兴（穆雷，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弗雷泽，马修 & 杜塔，苏米特拉.（2013）. 社交网络改变世界（谈冠华，郭小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黄旦（2019）. 试说“融媒体”：历史的视角. 新闻记者，3，20-26.
- 基特勒，弗里德里希·A. & 黄淑贞（2013）. 传播媒介史绪论. 文化研究，13，235-254.
- 莱文森，保罗.（2003）. 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郭建中，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苓（2002）. 传播学理论与实务.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李沁（2015）. 泛在时代的“传播”偏向及其文明特征. 国际新闻界，5，6-22.
- 刘丽（2018）. 传播媒介演化过程中人的政治延伸.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东南大学.
- 陆正兰，赵勇（2020）. 数字时代的身体意义——科幻电影中的三种虚拟人身体范式探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16-124+171.
- 洛根，罗伯特.（2012）.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麦克卢汉，马歇尔.（2000）.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米切尔，威廉·J.（2005）. 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乔非，俞晓，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尼葛洛庞蒂，尼古拉.（2017）. 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邵培仁（2007）. 传播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王勇，黄雄华，蔡国永（编）（2013）. 信息论与编码.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威廉斯，雷蒙.（2005）. 关键词（刘建基，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翁，沃尔特（2008）.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伯凡（2017）. 一本关于“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载于数字化生存.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吴海琳，王敬贤（2020）. 网络公共空间分化及其发展新趋向——基于缺场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实践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8-45.
- 延森，克劳德·布鲁恩（2012）.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骋（2017）. “媒介即讯息”，不是“媒介即信息”：从符号学视角重新理解麦克卢汉的经

典理论. 新闻界, 10, 45 - 50.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周旭 (2018). 理解赛博空间: 从媒介进化论到虚拟生存. 学习与实践, 9, 119 - 125.

Hansen, M. B. N. (2006).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3, 297 - 306.

Innis, H. A. (2008).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作者简介:

曹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文化。

陈华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文化、网络舆情治理。

Author:

Cao Da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edit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Newspaper*.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ew media and social culture.

Email: 736902319@ qq. com

Chen Huaming,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ew media and social cultur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Email: chenhuaming@ scu. edu. cn